

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

林 辰

清的末年，社会上大抵恶革命党如蛇蝎，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的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一路的呵。”

这是《华盖集·补白》篇中的一段。就由于有这类冒牌的投机取巧之徒，使得本不会向人自炫的真的“草字头”，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更加讳言自己的革命经历，像这段文字的写作者鲁迅先生，便是这种人中的一个。

当鲁迅留学日本时，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夕。在那如火如荼的东京留学界的革命活动里，鲁迅也实际地参加了政治组织，成为光复会的一员。光复会成立于一九〇四年冬，是清末一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和会党分子所组织，主要的领导者为章太炎、蔡元培和陶成章。它的会员，以浙江人为最多，鲁迅亦为浙东人的参加者。但他后来，无论在文字上，在口头上，都从未提及此事，故世间知道的人极少。直到他逝世以后，一九三七年，许寿裳先生在《鲁迅年谱》里，才把这件湮没了将近三十年的事，郑重地提了出来：

民国前四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年）二十八岁。

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集》。

由这，我们才知道了鲁迅生活史上的这一件大事，更清晰地寻出了鲁迅后来所沿以发展的思想行为的早年的线索。这在我们对于这位伟大作家的认识和研究上，实在是极其重要的事情。

然而，却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这人又正是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年谱》民元以前用阴历记载的部分，原许先生就周作人所记增订而成，周在原稿内即未载入光复会事。在《关于鲁迅之二》里，他更以正面的坚定的语气，积极地加以否认：

但他（指鲁迅）始终不曾加入同盟会，……他也没有入光复会。……以浙东人的关系，豫才似乎应该是光复会中人了。然而又不然。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不知道。（《宇宙风》第三十期，后收入《瓜豆集》）

因为有这正相反对的两说，遂致研究者纷纭莫定，或从许说，或从周说。前者如平心先生，他在《论鲁迅的思想》一书里，便据《年谱》肯定鲁迅为光复会会员，说：

鲁迅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猛烈攻击者，是民主政治制度的热烈追求者，因此他在辛亥革命时代，对革命怀着渴望光明似的期待，并且一度参加过光复会。（页七二）

当时孙中山，章炳麟等所推动的民族革命运动已经震动全国了。进步的青年都卷入在革命的浪潮中。鲁迅在发表上述论文（按指《摩罗诗力说》的次年一九〇八年），即‘从太炎先生炳麟学’，并且加入了光复会。（页一九二）

又如欧阳凡海先生，他在《鲁迅的书》的第五节里，也说：

这年（按指一九〇八年）豫才不但努力翻译新文学，并且直接加入光复会为会员。推翻满清的革命，到这几年已经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概，……革命的怒潮已向着每（个）角落里激荡，是在

这样的時候，豫才便也被卷入光復會里去的。（頁七九）

還有胡風先生，在《從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生長起來的》一文里，也說魯迅曾“加入了光復會”。在附注里，更舉出他和魯迅的一次問答：“周先生加入過×××（原文。當指同盟會）沒有？”“沒有，我加入的是光復會，不過這件事沒有人知道……”（《群眾》八卷十八期，後收入《在混亂里面》）這樣除了《年譜》之外又多了一項直接的材料了。

但另一方面，也有意見與周作人相近的人。如王冶秋先生，在《民元前的魯迅先生》一書內，便這樣說：

魯迅先生這一時期除了文藝以外，因出入民報社的關係，認識了許多同盟會的人，而與徐錫麟等同組光復會的陶煥卿（成章），也因徐刺恩銘案亡命來東京，因為同鄉的關係，常到先生的寓所或民報社談天。……可是結果先生既未加入同盟會，似也沒有入光復會。（《年譜》中作曾入光復會，知堂文中說並未加入，未知孰是。）（頁一〇八）

這裡雖未完全肯定，但語氣上，是傾向周說的。（他說“似也沒有入光復會”不說“似曾入光復會”。）所以下文接着便說：“他對政治組織沒有實際的參加。”（頁一一二）這顯然已是肯定地贊同周說了。

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呢？我的意見以為《年譜》所說“為光復會會員”，是符合事實的。

魯迅之赴日本，是在一九〇二年。自此以迄一九〇九，留日計凡八年。在這期間，國內革命運動，風起雲湧，武裝舉義，連年不絕；而東京以活動較便，途程較捷等關係，當時簡直成了革命的策動地。排滿的各種集會、講演，時有舉行；各種書報，紛紛出版。革命空氣，弥漫整個留東學界。在這種情形下，本來就是熱情、睿智，舊學新知，都已具有根柢的魯迅，又得接觸各種人物，閱讀各種書籍；感故國的飄搖，受異邦的刺激，在思想行為上，自然會發生很大的影響。他在出國以前，即已接受了“維新”的思想，到這時候，便自然地進了一步，接受了民族革命的思想。他遙對着“風雨如磐”的故國，立下了“血荐軒轅”的誓言和決心。

他宣扬与波斯王大战的斯巴达人的战斗精神和爱国主义；讴歌“立意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拜伦、普希金、裴多菲……诸诗人的“摩罗”精神。他之决意学医，是因为“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预备卒业回国，假医学“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他之放弃医学，改习文艺，是因为后来认清了“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文艺正是善于改变精神的利器。他介绍域外文学，特别偏重俄国和被压迫民族的作品，是想用那些叫喊和反抗的声音来激励处境相类的自己的民族。他往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目的并非专为获取知识，却是“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除了这些荦荦大端以外，还有一些细节，如徐锡麟、秋瑾被杀的消息传到东京后，人心愤怒，同乡会开会追吊，鲁迅也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清政府的无人道。他热烈发言，还坚决地和主张发电的人争论（《朝花夕拾·范爱农》）。有一次，他从仙台回东京，特地中途在水户下车，去凭吊明末遗民朱舜水的遗迹（见许寿裳：《王著 民元前的鲁迅先生 序》）。而且就在留日期间，他便毅然将发辫剪掉了。由这种种，可见鲁迅这时的一切言行，莫不与民族主义精神息息相通。在那时间，在那地点，他实在是有可能实际参加政治组织的。

这里，还值得特别述及的，是鲁迅当时所往还的那些人物。他在努力读书、作文、翻译以外，也和别的留学生一样，一有工夫，“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他这时的交友自然是极广的。但他对于那些只知道在会馆里“咚咚咚地”学跳舞（《朝花夕拾·藤野先生》）；关起门炖牛肉吃（《华盖集续编·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的无聊之徒，很看不惯。他所与交往的多是光复会、同盟会中人。如章太炎，是光复会的领袖，道德文章，革命勋业，彪炳一世，鲁迅曾从他问学，这里不用说了。章以外有陶成章，字焕卿，会稽人，光复会的中坚分子，与徐锡麟同为大通学堂的创办人，在江浙会党中极有力量，是清末革命史上重要人物之一。他与鲁迅往还颇密，后来鲁迅在所写的文字中，曾经一再提到他。其一，在《华盖集·补白》内：

徐锡麟刺杀恩铭之后，大捕党人，陶成章君是其中之一，罪状

曰：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何以学催眠术就有罪，殊觉费解。）于是连他在家的父亲也大受痛苦；待到革命兴旺，这才被尊称为“老太爷”；有人给“孙少爷”去说媒。可惜陶君不久就遭人暗杀了，神主入祠的时候，捧香恭送的士绅和商人尚有五六百。直到袁世凯打倒二次革命之后，这才冷落起来。

其二，在《华盖集续编·为半农题记 何典 后，作》内：

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穷得不堪，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以糊口。有一天他问我，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术不验，求助于药物了。其实呢，在大众中试验催眠，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求的妙药，爱莫能助。两三月后，报章上就有投书（也许是广告）出现，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以此欺人。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所以通缉他的时候，有一联对句道：“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

前者因有感于那些“漂亮的士绅和商人”的冒充“草字头”，因而联想到陶的真正革命；后者由刘半农的印《何典》而被“正人君子”笑骂，联想到陶的“教人催眠术以糊口”而被清政府通缉。语句之间，是那么充满同情、亲切、敬佩，可见两人在二十年前的交谊之笃。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里，也有几句提到陶成章，可供参看：

当时陶焕卿（成章）也亡命来东京，因为同乡的关系常来谈天，未生大抵同来，焕卿正在连络江浙会党，计划起义，太炎先生每戏呼为“焕强盗”或“焕皇帝”，来寓时大抵谈某地不久可以“动”，否则讲春秋时外交或战争情形，口讲指划，历历如在目前。尝避日本警吏注意，携文件一部分来寓嘱代收藏，有洋抄本一，系会党的联合会章，记有一条云：凡犯规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红布上盖印，又一枚红银者，云是“龙头”。焕卿尝笑语曰：“填给一张正龙头的票布如何？”数月后，焕卿移居，乃复来取去。

由此不难想见陶成章在东京时的活动情形和他与鲁迅的关系。又有龚宝铨，字未生，嘉兴人，亦光复会的中坚分子，与陶成章、徐锡麟等关系极深。他是鲁迅听章太炎讲学时的同学，上引周作人文说“未生大抵同来”，足见他们常相过从。那和徐锡麟相约同时举义而被杀的秋瑾女士，山阴人，光复会会员，亦与鲁迅熟识。许景宋先生在《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一文内，曾说：

秋瑾女士，是同时的留学生，又是同乡，所以也时常来访。她的脾气是豪直的，来到也许会当面给人过不去，大家对于她来都有点惴惴欲遁，但是假使赶快款待餐饭，也会风平浪静地化险为夷。那时女留学生实在少，所以每有聚会，一定请她登台说话，一定拚命拍手（《抗战文艺》六卷四期）

这末尾所说，大约是鲁迅当时在集会里常见的实情，他在《而已集·通信》中也曾略略提过。又许寿裳，字季荊，山阴人，与鲁迅一同就学于章太炎，为鲁迅的终生好友，亦光复会会员。此外还有陶冶公、陈澹等人。陶初名铸，字望潮，后以字行曰冶公，会稽人，成章即其侄子。在东京与鲁迅共习俄文，后在长崎从俄人学造炸药（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辛亥时曾率人攻打上海制造局（见《文坛》二卷一期陶著《悼鲁迅》诗前王冶秋按语）。陈字子英，山阴人，曾与徐锡麟在东湖密谋革命，徐殉难后，逃往日本（周作人：《关于范爱农》）亦鲁迅学俄文时同学（《关于鲁迅之二》）。光复后，绍兴少年们办《越铎》报，曾借用他和鲁迅的名字作发起人（报名据周作人：《关于范爱农》）。两人也都是光复会会员（据许寿裳先生复作者函）。这些人，在学识、性情、年龄上，名有殊异；和鲁迅往来的时间，有久有暂，情感也有深有浅；但他们却有一点共同的地方，就是都是光复会的会员（同盟会成立后，也有加入同盟会的）。从鲁迅所交往的这些师友，大约也可窥察出他当时是怎样的一个人罢。

再就归国以后的事实看，他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兼监学时，学生们便知道他“和同盟会及徐锡麟有过关系，……是革命党”（胡愈之：《我的中学生时代》）。不久，武昌起义，革命的风暴也卷及绍兴，这时鲁迅本早已于暑假中由绍兴府中学堂“走出”，但因时值光复，学校监督沈某

又已辞职，校务无人负责，学生乃推举代表，坚请前任监督陈澹和鲁迅回校主持，于是鲁迅又回校任监学数周（见《绍兴中学五十周年史稿》，一九四七年三月编印）。这时绍兴市上人心浮动，他曾召集全校学生组织了一个“武装演说队”，在市面上游行一通来镇静人心，对于绍兴的光复帮助很大（参照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孙伏园：《惜别》）。在绍兴光复以后，他便出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这时绍兴的都督为王金发，本绿林大学出身（见《范爱农》），也是光复会中人，与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竺绍康等同谋革命；“和鲁迅先生也是朋友”（见前揭景宋文），鲁迅在《范爱农》和《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二文里，曾提到过他。但较详细的是周作人的《关于范爱农》：

王金发本在嵊县为绿林豪客，受光复会之招加入革命，亦徐案中人物，辛亥绍兴光复后来主军政，自称都督，改名王逸，但越人则唯知有王金发而已。二次革命失败，朱瑞为浙江将军，承袁世凯旨诱金发至省城杀之，人民虽喜得除一害，然对于朱瑞之用诈杀降，亦弗善也。（《宇宙风》六十七期 后收入《药味集》）

鲁迅怎么会和这样的一个人“是朋友”；而且会在他当都督时任校长呢？这不会和光复会毫无关系。尤可注意的是，“他的得任校长，是当局对前任校长不满意，要他来继任之后，可以从办交代中，找出前校长的错处，做一个堂堂的处理的”（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这前任校长是杜海生，当局不满意他的原因，“是一般青年革命者，认为杜先生在秋先烈瑾殉难的时候，站在可以援救的地位而不援救”（孙伏园：《惜别》）。既然其中有此情节，那绝不是非光复会会员所能出任校长的。还有，后来绍兴少年们办《越铎》报来监督王金发，为什么又要借用鲁迅的名字作发起人呢？这恐怕不只在校长的地位，主要的还是他的革命事迹，使那些少年们发生景仰，进而以为他的名字可使王金发见而知所检束的吧。至于他后来常常用那么亲切的笔触去述说那“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他对章太炎的终生敬礼不衰，我想，这都和入光复会有关，决不仅是什么单纯的“同乡”或师生的关系所能解释的。

至于在否认者的一方面，论据实在极不充分。周作人只说：“这是

什么缘故呢？我不知道。”毫无道理，不在话下。王冶秋先生则举出鲁迅自己所说的：“革命的领袖是要有特别本领的，我却做不到。”以及《两地书》中的几句话来作为“原因”。由引证的完全相同上看来，王先生的结论，显然是接受了许景宋先生的影响而得来的。原来许先生在《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一文内，有一段道：

（鲁迅）对于革命的运动，因着自然的耳濡目染，虽则知道得很清楚，似乎还没有肯参加过实际行动，他总说：“革命的领袖者，是要有特别的本领的，我却做不到。”有一回，看见某君泰然自若地和朋友谈天说地，而当时当地就有他的部下在实际行动着丢炸弹，做革命暗杀事情。当震耳响声传到的时候，先生想到那实际工作者的可能惨死的境遇，想到那一幕活剧的可怖，就焦灼不堪。的确是这种脾气的，他对于相识的人，怕见他的冒险（见《两地书》），而回顾某君，却神色不变，好似和他绝不生关系的一般，使先生惊佩不置。所以他又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够做革命者。”在《两地书》中，先生也曾说过：“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这就是说明他之所以终生是一个思想领导者而不是实际行动者了。

景宋先生这段文字，初看去很容易令人误会：以为依照她的意思，鲁迅自然是不会加入光复会了。其实，仔细想想，她的意见，绝非如此，她引鲁迅的话并非用来证明鲁迅非光复会会员。——如果她引那些话是用来作为鲁迅未曾入会的“原因”，那便将解释不通：不错，鲁迅在《两地书》里曾说过这些话；鲁迅是思想领导者而不是实际行动的领导者，他没有自己去或叫人丢过炸弹，这些都是实在的。然而这何害其为光复会的会员？难道一定要是“领袖”或“领导的人”才会加入；或者，一加入之后，就一定非成为“领袖”或“领导的人”不可吗？事实上，光复会（以至一切政治集团）中并非人人都是“领袖”，人人都抛掷过炸弹。所

以，许先生在这段文字里，绝无证明鲁迅未曾入会的意思。“鲁迅是光复会会员，景宋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似乎还没有肯参加过实际行动’这一句，系指没有实地去运动那些秘密的会党以及投炸弹，举义旗……等事而已。”（许寿裳先生致作者函中语）明乎此，则王冶秋先生根据景宋先生文所作的结语，自然是不可靠的；何况他除了从许文中转录鲁迅的那几句话以外，便别无其他材料和理由呢！

根据上述种种，我认为：——鲁迅的确是光复会会员。鲁迅辛亥前在东京的志行、朋辈，以及辛亥后在国内的出处等等，都证明了许谱的记载是极可信的。

但为了慎重起见，我更特地写信去请教《年谱》的编著者许寿裳先生，问他所根据的是什么？承他复信说：

光复会会员问题，因当时有会籍可凭，同志之间，无话不谈，确知其为会员，根据惟此而已。至于作人之否认此事，由我看来，或许是由于不知道，因为入会的人，对于家人父子本不相告的。（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函）

这样，鲁迅之为光复会会员，是毫无疑问的了。

最后，还得申明，鲁迅是光复会会员与否，对于他的伟大，绝对无所损益。本文的目的，只在探究事实，因为这一事实，对于研究鲁迅早期的思想和生活是很有关系的。

一九四四年九月初稿

一九五四年六月改订

鲁迅与章太炎及其同门诸子

林 辰

鲁迅先生在东京留学时代曾游于余杭章太炎之门。当时这位从事排满运动最激烈的革命家和卓越的学者给了鲁迅很深刻的印象。此后三十年中，虽说他们的活动范围及思想路线各有不同，晤面的机会也不多，但鲁迅对章太炎始终保持着深厚的情感。他平时在口头和文字上曾经多次说到章太炎，在逝世前数日还将其最后心力倾注在回忆和评价章太炎的文章上，力疾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两文；后一篇竟成为他最后的绝笔。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实在是我们研究鲁迅生平事迹时所不可忽略的。

章太炎于一九〇三年六月（清光绪二十九年 癸卯 闰五月）因在《苏报》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 序》……等文 鼓吹排满 被清政府转请上海租界当局逮捕，囚禁三年，于一九〇六年六月（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五月）期满出狱 即赴日本 任《民报》编辑。同月 鲁迅正巧亦由家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他过去曾读过章太炎所著的《诂书》和在《苏报》发表的文字 这时 又很爱看《民报》 对章的人格和学问 极为敬仰。到了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民报》被禁 章太炎集留学生十余人，开国学讲习会于神田大成中学，鲁迅便于此时和几个朋友，另请章太炎于民报社讲《说文解字》。于是，鲁迅和章太炎，由此遂缔结了不同于平常的师生的深厚关系了。

鲁迅从章太炎问学的动机，据他自己所追述，主要是为了向往章的革命人格。他说：

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 索解为难 或说佛法 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 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 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鲁迅之外，同时前往听讲者，还有些什么人，鲁迅在文章里从未提及，但由他人的记载，可知还有七人。钱玄同先生云：

民元前四年，我与豫才都在日本东京留学。我与几个朋友请先师章太炎 炳麟 先生讲语言文字之学 音韵，《说文》）借日本的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开讲。过了些日子，同门龚未生（宝铨，先师之长婿）君与先师商谈，说是会稽周氏兄弟及其友数人要来听讲，但希望另设一班，先师允许即在其寓所开讲。（先师寓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中，《民报》为孙中山先生所主持，即同盟会之机关报也。）豫才即与其弟启明（作人）、许季蕓（寿裳）、钱均甫（家治）诸君同去听

按上句中的“×××”为吴稚晖，“××”疑为“献策”二字 指吴稚晖在《苏报》案中向清吏俞明震“献策”，出卖邹容、章太炎事。鲁迅另一篇《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所说章太炎和吴稚晖的“笔战”，即为此事，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斗争”。（“献策”二字，迭见于《民报》第十九、二十二号章太炎两次复吴稚晖书，请参看原书及《太炎文录》卷二《邹容传》。下句中的“×××”为蓝公武。《民报》第十号章太炎《与人书》有云：“某某足下：顷者友人以大著见示，中有《俱分进化论批评》一篇，足下尚崇拜苏轼《赤壁赋》，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所见如此，仆岂必与足下辩乎？”蓝公武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晨报副刊》发表的《“汗牛之充栋”不是一件可笑的事》中说：“当日和太炎辩论的是我，所辩论的题目，是哲学上一个善恶的问题。”由此知章函中的“某某”即蓝公武。（章太炎《与人书》后有一小段附白，指出当时蓝公武与张东荪主办的《教育杂志》上某文中所用“汗牛之充栋”一语的不通，一九二四年三月间，《晨报副刊》上常有人谈到这件故实，所以蓝公武写了这篇文章。）

讲，我亦与未生（朱蓬仙（宗莱）朱逖先（希祖）诸君再去听讲。（《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

又周作人亦云：

戊申年（一九〇八）从太炎先生讲学，来者有季黻，钱均甫（家治）朱逖先（希祖）钱德潜（夏，今改名玄同）朱蓬仙（宗莱）龚未生（宝铨）共八人，每星期日至小石川的民报社听讲《说文解字》（《关于鲁迅之二》）

至于章太炎当时讲学的情形及所讲内容，鲁迅与他人均从无记载。近承许寿裳先生写寄一段最珍贵的回忆云：

章先生精力过人，博极群书，思想高超，而又诲人不倦。我们八个人希望听讲，而为校课所牵，只有星期日得空，章先生慨然允许于星期日特开一班，地点在东京小石川区民报馆先生寓室，时间每星期日上午八——十二时，师生席地环一小几而围坐，师依据段玉裁氏《说文注》，引证渊博，新谊甚富，间杂诙谐，令人无倦，亘四小时而无休息。我们听讲虽不满一年，而受益则甚大。其说字之新颖，兹举一例以概其余：

单《说文》大也。章先生以为非本义。《毛诗·公刘》篇“彻田为粮，其军三单”单训为袭，是其本义。古文单作象其系联也。“其军三单”者，言更番征调，若汉时卒更、践更、过更之制，今时常备、后备、预备之制。凡禅位，蝉联，禅蝉皆单之借字，其军三单，更番征调，以后至者充前人之缺，与禅位同义，故曰相袭。经训与字义，契合无间。太史公《秦楚之际月表》曰“五年之间，号令三嬗”，三嬗正当为三单，不过所期之质不同而已。章先生之讲《说文》，此其一例。（一九四四年二月四日函）

这讲学“不满一年”，到第二年的夏天（一九〇九年六月），鲁迅便自日本归国了。

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章太炎与鲁迅南北睽隔，晤面的机会很少，但他们依旧保持着原有的关系，情谊之厚，不减当年。当一九一三至一六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被羁禁于北京时，鲁迅常常前往探视（见《鲁迅日记》），有一次章愤极绝食，大家没法子敢去相劝，还是推鲁迅亲自前往婉转陈词，才进食的（许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一九二五年，鲁迅在所作《补白》里，对民元时那些常常被章太炎贬责，因而给章起绰号曰“章疯子”的人们大加攻击，指出他们的“讼师”式的手段的卑鄙，替章的被诬作了辩明（见《华盖集》）。到一九二五至二六年间，章太炎变成了赵恒惕、孙传芳等人的“王者之师”（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中语），提倡读经，赞许投壶，每为论者所不满，周作人甚至轻浮地模仿章太炎之对俞曲园，写了一篇《谢本师》来表示和章脱离师生关系，说：“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语丝》第九十四期），而鲁迅却能原情度理，当时缄默，以后却说：“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见《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实在章太炎只是误被孙传芳等所利用，他的本意与孙等确不相同。到了一九三三年六月，鲁迅在给曹聚仁先生的信内，提到章太炎时，又这样说：“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词句之间，对章充满同情和崇敬，真是“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前函）。一九三五年，鲁迅因在《太白》上看见一篇文章说到章太炎的“保守文言”的意见，非深通小学就难做白话，于是又这样说：“如果做白话的人，要每字都到《说文解字》里去找本字，那的确比做任用借字的文言要难到不知多少倍。然而自从提倡白话以来，主张者却没有一个以为写白话的主旨，是在从‘小学’里寻出本字来的，我们就用约定俗成的借字。……因为白话是写给现代的人们看，并非写给商，周，秦，汉的鬼看的，起古人于地下，看了不懂，我们也毫不畏缩。……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临末却特别这样申明：“我很自歉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大约也无伤于先生的‘日月之明’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名人和名言》）这结末数语，诚挚厚道，感人

至深。而在章太炎的一面，对鲁迅也极为关怀，他“最后一次到北平去，门徒们公宴席上问起鲁迅先生说‘豫才现在如何？’答说现在上海颇被一般人疑为左倾分子。太炎先生点头道：‘他一向研究俄国文学，这误会一定从俄国文学而起。’”（孙伏园：《惜别》）他们师弟之间的情谊真可谓数十年如一日，至死不衰，实在是极为难得的。

但鲁迅对于章太炎也并不是没有批判，没有保留的。上引《名人和名言》，已经对章太炎“保守文言”的意见提出过反驳；尤其是对于章太炎晚年的隔绝现实的学者生活，常常表示惋惜和不满，如在《趋时和复古》一文里便这样说：“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见《花边文学》）到了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章太炎在苏州逝世，鲁迅在病中写了一篇《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其中又这样说：“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但除了这些意见之外，鲁迅在后举的这篇《二三事》中，更十分正确公允地提出了他对章太炎的整体看法。他说：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见《且介亭杂文末编》）

这篇文章，抉发了章太炎的真精神，估定了章太炎的真价值，打击了“不自量”的“蚍蜉”们对章太炎的奚落，一字一句，不可改易。如果要在章太炎死时及以后一切纪念研究之文里找出一篇盖棺定论来，那自然非鲁迅这篇莫属了。

自一九〇八年鲁迅认识章太炎之日起，两人的关系，持续了将近三十年。显然，鲁迅所受于章太炎的影响是相当大的。第一，是继承了章太炎

的“七被追捕，三人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的优秀传统，并进一步的加以发扬，为被压迫被损害的人群，为中国的自由和进步，奋斗了一生。第二，是继承了章太炎的文章风格。章太炎文尚魏晋，澹雅有度。而鲁迅早期所作古文，亦极得力于魏晋文。从前刘半农曾赠给他一副联语，是“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一般友朋都认为很恰当，他自己也不加反对（孙伏园：《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杂感二则》）。据鲁迅在《坟》的《题记》和《集外集·序言》里自承：他早年作文“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完全是“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后来虽然改做白话了，但偶作文言，亦仍保有魏晋风格。第三，在待人接物上，鲁迅也承受了章太炎的风度。章太炎态度冲睦，从没有什么大学者的架子，与人论学论事，如谈家常。鲁迅在这方面正也一样。无论对朋友、学生、青年，他的态度，都极谦和宽厚，仁蔼可亲。以上三点，自然不能说鲁迅是完全受了章太炎的影响，还有其他种种条件存在；但在一定程度上所受于章的影响，确是无可否认的。

以上，已详述了鲁迅从章太炎问学的情形，两人以后的关系，章死后鲁迅对他的批评，以及鲁迅所受于章的影响等等。现在再附带一说其他七人的略历和他们后来与鲁迅的关系。

许寿裳，字季蕓，山阴人。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归国后历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教育部参事，江西教育厅长，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大学院参事、秘书长，中央研究院文书处主任，南北各大学教授，台湾省立编译馆馆长，台湾大学国文系主任。他与鲁迅交谊极厚，不特性情思想相近，即行动亦多契合：同年（一九〇二）赴日（鲁迅早到若干日）同在弘文学院预备日语（见许著：《怀亡友鲁迅》）同筹《新生》杂志（一九〇七），同请孔特夫人教俄文（一九〇七），请章太炎讲《说文》（一九〇八）又同于一年（一九〇九）归国（许在春季，鲁迅在夏季。据许先生致作者函），同在浙江两级师范任教。以后，同由海道赴北京（一九一二）。同住绍兴会馆（许著：《怀旧》），在教育部、在北大、女高师、女师大及中山大学等校，又为同事。据许追述：

自民元前十年秋至民国十六年夏，整整二十五年中，除了他（指鲁迅）在仙台、绍兴、厦门合计三年余，我许自称在南畝（民国六年冬——九年底）三年外，晨夕相见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

十六年广州别后，他蛰居上海，我奔走南北，晤见虽稀，音问不绝。
(《怀亡友鲁迅》)

由此可见二人相处之久，情谊之厚。他为人正直，富正义感，又写了许多关于鲁迅的文章，尽力向广大社会宣扬鲁迅精神，因此为国民党反动派所忌，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深夜被刺杀于台北。著作散见各报章杂志 关于鲁迅者 有《鲁迅年谱》及《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书。

钱夏，字中季，号德潜，后改名玄同，又取号曰“疑古”，常效古法，缀“号”于“名”上，曰“疑古玄同”。吴兴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归国后，曾任浙江教育司科长，北京大学、师范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编辑。已故。他是文字学、经学专家，“五四”时参加新文化运动，主张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在教育学术界颇负时誉。他与鲁迅在“五四”前后数年间，过从甚密。鲁迅之开始在《新青年》上写文章，便是由于他的怂恿。他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里，曾经述及此事：

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自此以后 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 有论文 随感录 诗 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

鲁迅在《自叙传略》里也说：

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集外集》)

在《呐喊·自序》里，鲁迅更具体地将钱玄同怂恿的话记了出来：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 脱下长衫 对面坐下……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这所谓“金心异”，就是指钱玄同。因为林琴南在小说《荆生》里，用“金心异”三字来影射钱玄同，鲁迅这里，顺便借用了。在这两节文章里，提到钱玄同，鲁迅都是用了很亲切的笔触的。他也很称道钱玄同的文字，曾说：

其实畅达也自有畅达的好处，……例如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两地书》一二）

但由于时代的进展，到了后来，两人思想见解日趋歧异，钱玄同的有些言论，很为鲁迅所不满，于是两人遂渐渐疏远了。钱玄同曾发过“人过四十，便该枪毙”这样的怪论，鲁迅所作旧体诗《教授杂咏四首》中，有一首就是讥嘲他的：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见《集外集》）

一九二九年五月，鲁迅由上海赴北平，在一次给景宋的信里，有几句道：

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两地书》一二六）

后来钱玄同在《追忆与略评》一文里，说这“金立因”便指的是他，曾加辩解说：